

地方性会馆研究的厚实之作 ——评刘正刚的《广东会馆论稿》

朱湘云

(厦门大学 历史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000-422X(2007)02-0109-05

会馆是明清时期发展起来的一种地缘或业缘性传统社会组织。它建在通都大邑,根植于传统市场经济扩张、人口迁移和流动频繁、商人子弟不断入仕的社会大环境中,通过不断调整自身机制来适应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因此可以说,会馆是观照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一面镜子。200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暨南史学”系列之《广东会馆论稿》^①(以下简称《论稿》)就是通过广东会馆来研究中国明清社会的一部好作品。

从区域性角度来研究会馆史是学界近年来新兴的方法。^②该方法是把会馆与某个区域的社会环境、发展历史结合起来观察,以局部描写来反映综合环境,这也是传统的大而全的宏观研究所不具备的优势。《论稿》显然是利用了这种优势,并将其臻于完善——在同一历史时间(明清至民国)层面上选择多个区域(北京、天津、上海等)结合当时当地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情况对广东会馆做微观研究。这样既能避免因囿于一地而导致的以偏概全的结论出现,也能弥补因笃于宏观综述而忽视个别特征的缺憾。

研究广东会馆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会馆的社会性质问题,这既是学界长期纷争不下的一个难点,也是《论稿》要解决的一个重点。以往的研究是将会馆与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挂钩,所

以很自然地将会馆等同于工商业行会、公所、行。^③虽然也有个别学者对会馆的性质作出了不同的见解,^④但因呼声微弱,未能取得学界的共识。《论稿》作为21世纪会馆研究的最新专著,在对待会馆的社会性质问题上,采取了保守的态度。作者结合大量的碑刻、档案及相关文史资料对北京、天津、上海、苏州等地的广东会馆进行了细致的剖析,其内容涉及到会馆的创建背景、运行机制(资金管理、人事变动、会员结构)、社会活动(政治、经济、文化)、价值取向、兴衰原因等众多方面。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始终没有给会馆的性质作出明确的诠释——他只是提供丰富的事例和翔实的数据让学人去判断会馆的性质。

首先是试馆的性质问题。以往的多数论著是将北京的试馆与工商业会馆划清界限,并不予以重视。^⑤作者却对这个观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拨。他肯定了北京的广东试馆的创建宗旨是“专门为在京的广东举人、仕宦等同乡服务”,同时又用大量资料证明了试馆也具备商业化倾向,其间涉及到会馆的成员构成、馆产分布、资金支配和投资对象等各方面。最后,作者得出结论:“明清时期,我国国内的统一市场网络已经逐渐形成,新兴的生产关系已由萌芽走向发展,在这微妙的社会经济转型时期,人的商品意识不断增强,人们的一切活动均被有意或

[收稿日期] 2007-02-05

无意地纳入到商品经济的轨道上来。地域性会馆作为一种民间自发的同乡组织,要维持正常的社会活动,其经费来源除向同乡仕宦或商人募捐外,另一途径即是利用会馆组织的自身优势,积极参予到商品经济的竞争中去,通过多种经营来不断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只有这样才能在异地他乡立足发展。明清时期,北京的广东会馆无一例外地参予了当地的商品经济活动,其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明显的商业性质,而这与当时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相一致。”^⑥这个论断显示了作者仍秉持着学界历来对会馆经济行为重视的原则——毕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对人类社会所普遍适用的规律。

其次是工商会馆的性质问题。在谈到天津、上海等地的广东工商会馆时,作者认为其性质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纯工商业性质的行会或行。因为这些工商会馆的成员广东商人“在积极从事商业活动的同时,还不断地参与各种有关国计民生的社会活动”,^⑦比如支持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抗日救亡、兴办义学与义园等。作者还特别重视工商会馆的文化行为,因为文化可以从精神上团结乡情,比如每年中元节的盂兰盆会,不但是天津、上海还是苏州都是较有影响力的“广东”风俗节日。还能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比如天津的广东会馆的独特的戏剧舞台和上海广东街上的“广东大剧院”都是粤剧与其他剧种交融的地方。^⑧此外,各地现存的带有广东色彩的街名、地名,巷名、物名等等——这些都是会馆的中国特色留下的历史足迹,它使得中国的会馆远比纯工商性质的行、行会、公所更具有传统文化的魅力。

再次是移民会馆的性质问题。作者也有不同的看法。在“四川的广东会馆”一章中认为:“清代四川的广东会馆在性质上属于移民会馆,尽管这之中会馆的建设,一定也会有不少商人的参与,但四川会馆的商业性质始终不占主流,多数会馆实际上是移民自治的一种乡村基层组织,这与天津、上海等地广东会馆的商业性质和北京、广东会馆的试馆性质有明显不

同。”^⑨同时,针对美国人马士在《中国行会考》中对广西境内的会馆界定:“名义上,它(即会馆——引者)是同乡人的组织,而实际上,并不仅仅如此。同乡会馆的建立纯粹是为了发展他们的自己的贸易。在外地的同乡商人结成具有共同利益的会员关系,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免外地商人的竞争和官府勒索。”^⑩作者也提出了质疑,“这一时期的广西也是广东移民的重要去处之一,因此,也不能完全排除明清时期广东人在广西建立的会馆有非工商性质,而是类似于清代四川的广东移民会馆。”^⑪

纵观《论稿》中作者对三类会馆的研究,虽然资料翔实,但在理论上并没有更大的突破。很多时候,作者只是对学界已有的观点提出建设性意见。^⑫这就意味着,作者注意到了会馆的性质会由于所处环境和时期的变化而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发生变化,并且这种变化造成了会馆在性质界定上的困难。这恐怕也是作者始终不给会馆性质下定论的原因。

《论稿》重视会馆的经济行为论述,这固然是受到了长期以来研究风尚的影响。但与以往的研究最大不同的是,《论稿》不再用西方的基尔特(Guilds行会)理论——只重视会馆的经济行为,忽视会馆的政治与文化行为,忽视会馆作为中国近代化的产物所具有的特点——来考察广东会馆。事实证明,只有将所忽视的与所重视的相结合才能真正揭示会馆在明清社会所扮演角色,才能对会馆的性质作出正确的判断。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的:“会馆的建立首先是对城市发展中房地产业的支持,其次是以会馆为中心所举办的具有浓郁家乡风情的文化活动,丰富了所在地社会的文化生活。更重要的是,会馆往往是人们集会、联谊乃至互通信息的主要场所,也是商人堆放货物的主要场地。……会馆的各类活动在更广的范围内将中国的区域市场、地方风土文化等联系在一起,反过来又促进了是明清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区域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以及人口流动活跃。”^⑬换句话说,会馆的一切活动始终是与经济分不开

的。要全面考察会馆,就必须在资料上对会馆实行完全占有。正是基于这个认识,《论稿》避开了以往只重视经济资料收集的偏狭,对会馆的政治、文化、公益行为等方面资料也作了详尽地搜集和补充,即使是工商会馆也不例外。

比如就孙中山在民国初期向潮州会馆借款一事,作者特别注意到了孙中山在借款信中任命潮州会馆的三名董事为驻沪筹饷局局长一事。^⑬并由此得出结论:“这除了反映孙中山在革命活动中的财政困难外,也充分说明民国以后,会馆的角色已由过去关注商帮或小同乡、小团体的利益,转变为关注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命运。”这个结论对会馆性质易受外部环境因素侵扰而演变的特点作了揭示——这是以往一些学者所强调的观点。^⑭

又比如,考察会馆的地域构成和地理分布对于研究会馆的性质问题的解决具有非常的意义。因此,作者考察北京的广东会馆时,就搜集以往有关会馆的地域构成数据作了归纳和统计,并得出结论:“清代在北京建立会馆的广东人主体是珠江三角洲以及广东沿海地区的府州县。而广东漫长而广阔的沿海地区,正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经济区域,作为全国十大著名商帮之一的广东商帮主要就是从位于沿海地区的广州商人和潮州商人所组成。这就需要我们重新探讨北京会馆的性质问题。”^⑮;在考察苏州的广东会馆的祀产分布时,作者就注意到:“苏州潮州会馆的祀产,除了大多数坐落在吴县阊王图土名义慈巷口和上津桥外,另有部分坐落在吴县阊三图的上塘街、阊二图南濠中正弄。更有少数坐落在外地,如乾隆三十四年(1769)就在京师琉璃厂延寿寺街购置房屋1所。”^⑯这个发现是以往没有的。又如四川的移民会馆的地理分布,以往的研究是只做个大概的统计,并且很多地方志只记录州县治所在的会馆(南华宫),却对乡村基层社会各场镇的南华宫分布情况则多略而不计。作者根据民国《续修大竹县志》卷三《祠祀志》、道光《中江县志》卷二《建置志》、《西昌县志》卷六《祠祀

志》等历史文献和今人的统计,推出“清代四川的广东移民会馆总数当在300所以上。……南华宫是研究清代广东移民在四川各地分布最有力的实物证据。广东会馆在四川的广泛分布,不仅反映了广东移民对四川社会经济的全面开发做出了贡献,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讲,以南华宫建筑为场所的人六祖祭祀活动,无疑会对四川民俗文化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⑰

数据是《论稿》的一大特色。这些数据或来源于碑刻文献、或来源于已有的研究结论、或来源于作者自己的田野考察报告,条条均有出处,体现了《论稿》在思维上的严密逻辑性和科学性。比如,明清时期的广东领属广、肇、韶、南、惠、潮、高、雷、廉、琼十府和罗定州。因为各个区域在经济上的发展不平衡,决定了这些区域在省外或省内的会馆活动情况也大相径庭,而这大相径庭也正是中国传统社会组织在近代化过程中的不同表现。所以,作者考察了广东境内广东人自建的地缘性会馆的地域性构成,他发现:“广东各地商人在省内建立的地缘会馆共有90个以上,其中广州会馆37个以上,潮州会馆22个以上,两者合计59个会馆,占整个广东地缘会馆的70%左右。”并推出结论:“明清时期全国十大商帮之一的广东商帮主要是由广州帮和潮州帮所组成。广东会馆的分布也证明了广州帮和潮州帮两大商人群体力量的强大。而清代广州、潮州两地本身即是广东境内外商业活动的重要中心地。”^⑱

这个结论正好与前几章对天津、上海、苏州等重要经济城市的广东会馆的相关数据相符。^⑲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特别关注潮帮和广帮的资料收集。在“天津的广东会馆”之第五节“闽粤会馆中的粤商的裂变”中,作者仔细回顾了天津早期最活跃的闽粤会馆的发展状况以及会馆的两大帮派——潮帮和广帮在道光末年的裂变经过,对这一段恩怨的真实内情作了披露;在“上海的广东会馆”之第三、四节中,作者以在当时商界成立较晚却影响最大的广肇会馆和素有“潮州门槛”之称的潮州会馆为个例,详尽

地罗列并分析了两个会馆在上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情况。特别是对潮州会馆的讨论,诸章均有大量笔墨涉及——这也是对近年来“潮州学”研究热潮的回应,^①显示出《论稿》在学术领域的前瞻性。

重视田野考察也是《论稿》的另一特色。会馆的遗存情况和现实分布既是了解会馆历史的一个窗口,也是发掘隐蔽文献资料的一个场所。作者很善于利用他人的实地调查来充实自己的见闻。如,对广东境内会馆数量的调查,作者结合了1919年的《广州指南》、1939年的福建《上杭县志》、1999年的《广州荔湾区实用手册》等多种实地调查资料进行归纳;^②此外,作者自己也多次深入其境进行实地考察。如,作者于1996年在赴天津开会时,参观了天津的广东会馆(现为天津戏剧博物馆),注意到会馆的构造特点、内存的5块捐款碑刻等遗存,并获得新发现。^③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作者用十年的心力打造的《论稿》堪称为明清时期广东会馆的资料库。该资料库范围广,历时长,方式多,所有关于广东会馆的研究都可以在这里得到大量的具有普遍性和说服力的证据。因此,《论稿》不愧为一部地方性会馆研究的厚实之作。但是璧有微瑕,《论稿》也存在些许遗憾。比如,作者过于重视文献资料和考察报告的排比,而较少在理论上有了新的突破,特别是对备受学界争议的会馆性质问题,始终没有作出明确的诠释。诚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不管是哪种性质的会馆,在明清相对发达的商品经济中,都难免会沾染商业气息。”^④其中“沾染”一词表明了作者对会馆性质的暧昧态度;又如,作者虽然构建出明清时期的广东会馆的三维(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但是对该会馆显别于其他地域性会馆的特征,并没有深入挖掘,没有突出“广东”特色。广东会馆在特征上的泛化,反映了这个体系还有不尽人意之处;再如,此书只是勾勒了明清至民国时期的中国大陆的广东会馆,而对海外的广东会馆只能根据已有的材料,作简单

的归纳。无论如何,《论稿》的成就是无可厚非的。作者以“论稿”为名,更是用谦逊的态度给学人留下了许多期望。

注释与参考文献

- ①刘正刚:《广东会馆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
- ②这部分研究可参见:陈连营的《客商与清代河南农村经济》,载《中州学刊》,1992年第2期;林国平的《福建科举会馆的兴衰嬗变及其原因》,载《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2年第1期;胡春煥、白鹤群的《北京的会馆》,载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郭绪印的《“一·二八”期间潮州旅沪同乡会的抗日救国活动》,载《潮学研究》,1994年第1期;陈炜、吴石坚的《商人会馆与民族经济融合的动力探析——以明清时期广东会馆与广西地区为中心》,载《贵州文史丛刊》,2002年第2期;张树枫的《近代青岛的三大会馆与青岛商会》,载《近代中国的城市·乡村·民间文化——首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版等。
- ③这部分研究可参见:全汉的《中国行会制度史》,见台湾食货出版社,1930年版;洪煊椿的《论明清苏州地区会馆的性质和作用——苏州工商业碑刻资料剖析之一》,载《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雷大受的《漫谈北京的会馆》,载《学习与研究》,1981年第5期;顾廷培的《上海最早的会馆——商船会馆》,载《中国财贸报》,1981年5月16日版;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82年版;汪仕信的《论明清商人会馆》,载《平淮学刊》第3辑下册等。
- ④此部分研究可参见:吕作燮《明清时期的会馆并非工商业行会》,载《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刘正刚《明清广东会馆的价值取向》,载《暨南学报》,1998年第2期。
- ⑤这部分研究论著可参见:全汉的《中国行会制度》,台湾食货出版社,1979年再版;雷大受的《漫谈北京的会馆》,载《学习与研究》,1981年第5期;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82年版等。
- ⑥引用处分别参见《论稿》“北京的广东会馆”之第7~8页、第8~13页、第13~14页。
- ⑦见《论稿》“天津的广东会馆”,第65~70页。

- ⑧对天津的广东会馆,相关论述可参见:《天津建立第一个戏剧博物馆》载《中国戏剧》,1986年第9期;《中国戏剧史的缩影——介绍天津戏剧博物馆》载《戏剧艺术》1989年第4期;《神奇的舞台——天津戏剧博物馆》,载《中国京剧》1992年第6期等。
- ⑨见《论稿》“四川的广东会馆”第306页。
- ⑩见彭泽益主编的《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第79页所引。
- ⑪见《论稿》“广西的广东会馆”,第275页。
- ⑫关于广东会馆的政治活动研究,可参见:郭绪印的《上海潮帮与孙中山的关系》载《潮学研究》1994年第2辑;唐仕春《试论北洋时期同乡会馆与请托》载《北京档案史料》2004年第4辑;胡小安的《粤东会馆与明清广西社会变迁》,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第2期等。
- ⑬见《论稿》“前言”第10页。
- ⑭见陈旭麓、郝盛潮主编的《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07~408页。
- ⑮主要参见: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 ⑯见《论稿》“北京的广东会馆”第6页。
- ⑰见《论稿》“江苏的广东会馆”第172~173页。
- ⑱见《论稿》“四川的广东会馆”,第292~293页。
- ⑲见《论稿》“广东境内的会馆”,第240页。
- ⑳见《论向》第61页、87页、109~110页、171~172页等,对潮帮和广帮的商业性状况均有详尽的数据说明。
- ㉑关于潮州会馆的研究,较有成就的可参见:蔡鸿生的《清代苏州的潮州商人》载《潮汕文化论丛初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周昭京《潮州会馆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郭绪印《“一·二八”期间潮州旅沪同乡会的抗日救国活动》载《潮学研究》1994年第1辑。
- ㉒见《论稿》“广东境内的会馆”第223~225页。
- ㉓见《论稿》“天津境内的广东会馆”第61页。
- ㉔见《论稿·前言》第5页。